

总主编◎王松林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

Communic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ross Cultures:
Rhetorical and Linguistic Challenges
in Chinese Medicine Terms Translation

中医跨文化传播： 中医术语翻译的修辞 和语言挑战

唐 韧 著



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资助项目
宁波大学学科建设重点培育学科点资助项目

总主编◎王松林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

Communic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ross Cultures:
Rhetorical and Linguistic Challenges
in Chinese Medicine Terms Translation

中医跨文化传播： 中医术语翻译的修辞 和语言挑战



唐 韧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多视角多、多维度探讨了中医术语的特性及翻译方法,借助中医学、翻译理论、术语理论以及语言学,对中医术语的生成机制、句法语义乃至修辞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医术语翻译的方法,明确提出:中医跨文化传播的主要挑战来自中医中医术语的语言修辞特性,这种特性不仅源于汉英语言的差异,也源于有着深厚的中国哲学与文化的中医与西医的巨大差异,采用源语导向的方法(即以语义翻译为主),方能使中医思想不至于在目的语文本中失真,原因是,目的语导向的方法提供明显为读者熟悉的术语,便于理解,但掩盖了中西医的差异,未能尽显中医概念的深刻而独特的内涵,本书首先相关翻译理论和术语理论对中医翻译进行理论上的阐述,继而西医术语英译、德译、汉译的方法进行比较分析,从中发现对中医术语英译的启示,借鉴其成功的经验。此外,本书评析了诸多中外中医术语译者及研究者所提出的关于中医术语翻译的理解,以寻求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医术语源语导向的翻译方法,包括借用、借译、独立于源语构词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医跨文化传播:中医术语翻译的修辞和语言挑战/唐韧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5.6

(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王松林主编)

ISBN 978-7-044822-4

I. ①中… II. ①唐… III. ①中国医药学-翻译-研究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4406 号

责任编辑:阎 莉 张 培 / 责任校对:蒋 萍

责任印制:张 倩 / 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佳信达欣艺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年6月第一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4

字数:290 000

定价:7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丛 书 序

本套丛书取名为“当代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求索丛书”，旨在向学界展现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近年来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研究特色，丛书涵盖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文化研究等方方面面的内容。

在我国，外国语言文学学科是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所涉及的研究领域或曰研究方向主要有外国语言研究(含语言本体研究和语言应用研究及语言学的跨学科研究等)、外国文学研究(含文学理论与批评)、翻译研究、国别与区域研究、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等。其中，外国语言研究属于语言学学科，是研究外国语言及其应用的综合性学科，主要涉及语音学、音位学、词汇学、形态学、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等基础性的语言本体研究，也涉及形式语言学和功能语言学等理论流派研究，还涉及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文体学、语篇分析等跨学科领域。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主要包括外语的教学、使用、规划和政策以及二语习得、外语能力测评、双语和多语现象、语言与思维、心理活动及行为的关系、言语产品的加工与合成(含机器翻译)、词典学等，不一而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影视研究、性别研究、种族研究、数字媒介研究及新闻传播研究等诸多与其他人文学科相关的内容纳入到了本学科的研究范畴。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的外国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发展迅猛，大量国外的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理论(包括翻译理论)、文学批评理论及文化批评理论由中国外语界学者介绍、吸纳和消化并自觉地运用到他们的研究领域。尤其令人欣喜的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研究疆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开阔，跨学科、多界面的研究催生了诸多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譬如，近年来国内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就大量吸收了语言哲学、心理学、脑科学、系统论等学科的成果，不再囿于学科内部的界面研究；其他如神经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也是跨学科研究的产物。外国文学研究也在世界多元化浪潮语境下呈现出超越和打破传统研究界限的局面。在传统的文学研究领域，外国经典文学被视为研究的“正典”，而通俗文学往往被边缘化，时至今日，这一泾渭分明的研究界线已被打破；自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多视角的文学批评方式如生态主义、新历史主义、后

殖民主义、性别和种族批评以及文化研究等丰富了文学研究的内涵，文学研究的空间不断扩大和深化；网络文学这一借助超文本和多媒体载体的互动性极强的文学表现形式颠覆了传统的写作范式，成为当下学者不可避免的研究课题；当代多元文化语境下文学作品中蕴含的政治、伦理、法律、环境、族群、性别等诉求备受关注。翻译研究本身就是一门跨学科的多界面的学问，它建立在语言学、符号学、人类学、信息论、心理学等交叉学科之上；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纯语言学理论在翻译研究中的比重有所减弱，跨界面的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不断引入翻译研究，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所涉及的因素和问题的复杂性可能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所以翻译研究自然也必须呈现出跨学科的开放姿态。综上所述，二十一世纪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将迎来一个开放性的、跨学科的崭新时代。宁波大学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也在这样的学术环境和学科融合中积累着研究成果，凝练着学科特色，沉淀着学术滋养。

宁波大学是由国家教育部、国家海洋局、浙江省和宁波市共建的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学校在1986年由世界船王包玉刚先生捐资创立，邓小平同志题写校名；建校之初，由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原杭州大学五校对口援建；1996年，原宁波大学、宁波师范学院和浙江水产学院宁波分院三校合并，组建为新的宁波大学，成为学科门类齐全、科教特色鲜明的综合高校；1992年被列为全国高校招生第一批录取院校；1995年首批通过原国家教委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2000年被浙江省人民政府列为省重点建设大学；2003年接受教育部普通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并获得“优秀”等级；2007年被增列为博士学位授权单位。宁波大学外语学院(起初名为宁波大学外语系)是宁波大学建校之初最早建立的五个专业系科之一，由当时的杭州大学外语系对口援建，办学起点较高，在近三十年的办学历程中形成了学科健全、特色鲜明的办学格局。

宁波是一座开放性的、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港口城市，“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是这座城市的名片。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也是一个开放性、跨越式发展的学科，“笃信达雅”是宁波大学外语学院的院训。本学科拥有一支充满朝气的学术团队，经过近30年的不懈努力，学科建设取得了突出的进步。2005年本学科成为浙江省唯一的外国语言文学类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10年获得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授予权，2011年新增翻译专业硕士点(MTI)；已建成国家特色专业1个，国家精品课程1门，省创新团队1个，获得省部级科研成果奖8项。目前，

本学科共有教授 20 人、副教授 30 人、博士 25 人、在读博士 5 人。近五年来，学科获得国家社科基金课题 18 项（其中在研 16 项）、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 16 项、省哲社规划课题 19 项。近五年来在 CSSCI 收录期刊上发表了 160 余篇论文，覆盖外语类全部核心期刊，出版学术著作及教材 50 余部。基地学术梯队合理，发展潜力巨大。本学科已形成五个稳定的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日语语言文学、德语语言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学科在以下研究领域具有特色并在国内学界形成一定影响：认知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研究、英美文学与文化批评研究、二语习得研究、文学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践、日本现当代文学及中日文化比较研究、德语文学与文化研究。本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学科排名在浙江省省属院校中位居前列。据教育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的研究数据（2013 年），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在全国同类学科中排名第 37 位（并列）；教育部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2014—2015 中国研究生教育及学科专业评价报告》显示，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位居全国同类学科的前 10.5%。

本套丛书得到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宁波大学中央财政专项（“外国语言文学”）项目的资助以及宁波大学研究生院、宁波大学人文社科处的大力支持，科学出版社与我们真诚合作，旨在打造一批学术精品，既展示已有研究成果，又谋划未来探索之途。丛书出版之际，我们谨对所有支持和关心过我们的机构和个人表示衷心感谢，并真诚期盼继续得到你们的关爱和关心！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发展和成长得益于我国外语学界诸多前辈和同仁的大力扶持，在此我们深表谢忱！我们祈盼学界专家一如既往进一步支持我们的学科建设工作。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宁波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全体教师和科研人员深知学术求索之艰辛，更深知学术追求乃大学教师终其一生力臻自我完善的必由之路。本套丛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年来宁波大学外语学科学者特别是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成果，丛书中一定尚存诸多值得商榷的学术问题，敬请海内外方家对其中讹误和瑕疵给予批评指正。

王松林

2015 年 2 月 5 日于爱丁堡

前 言

中医药名词术语的规范化,是中医药学一项重要的基础性系统工程,对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中医药知识的传播、国内外医药交流、学科与行业间的沟通、中医药科技成果的推广使用和生产技术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从事中医英语的专业人员不仅要懂得中医,具有深厚的英语功底,还应该具有良好的中国古典文化修养、丰富的实践经验,以及开放的整体视野。这是由于中医翻译过程明显受到文化限制,翻译者的文化背景势必会影响他的分析、转换、重构活动,如果翻译者不熟悉中医文化背景知识,不熟悉中医学的特殊表达法,将不能准确地传递信息从而无法胜任中医的翻译工作。

近几十年来,中医在西方越来越受欢迎,然而中医知识向西方的传播一直难尽如人意。除翻译不多外,当前不少相关的英语文献并非来自第一手中文资料(Birch & Tsutani 2003),中医药传播的方式各异,常常强调不同的方面,术语方面各自为政,这些都带来不利影响。本研究试图说明,如果原文概念被忠实地保留于译文中,使用与源语术语密切联系的大体直译对等语的源语导向的翻译方法不仅可行,而且也是被期望的,甚至是必要的。此类方法为典型的跨文化间全面而准确地传播知识的一种方法。

中医术语翻译中,常面临着音译、直译、采用西医术语之间的选择。有人提出,音译常常是最佳方法,是相当可行的,因为英语传统上是借词的;而另一些人提出,应该选择现有的英语词因其易于记忆。此类观点都难令人信服,这是因为对中医术语的讨论没有考虑各种选择之动机的语言外因素,没有考虑中医如何被看待这一更深层次的问题及传播目的。

不同的翻译方法用于不同目的,某些类型的文本往往以某些方式来翻译,而同样的文本根据译文要达到的目的而采用不同方法翻译。翻译理论家所观察到的翻译两极被用不同名称称呼,Lawrence Venuti 称之为异化 (foreignizing) 和归化 (domesticating) 翻译,即源语导向翻译 (source-oriented translation) 和目的语导向翻译 (target-oriented translation)。源语导向和目的语导向概念不是纯粹翻译或语言学范畴,源语导向意味着忠实于文化输出方的概念,而目的语导向意味着忠实于接受文化本土概念。术语翻译应该是源语导向的。首先,借用不可行之处,借译是可行的。从专门用途语言 (LSP) 的概念来看,术语绝非完全任意的,常常反映概念场中某一概念的关系;其次,借用和借

译方便掌握双语的人，他们作为传播过程中源语的目的语间的重要联系，需将目的语术语与源语中的对等语联系起来。笔者在本书中区分了一般用途语言 (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s) 用语 (日常词语，如 head、chest、kidney) 和专门用途语言 (Language for Special Purposes) 术语 (如 stapes、renal pelvis)，提出如下翻译方法：①一般用途语言 (LGP) 对等语 (如 foot 表示拉丁语的 pes)；②借词 (如英语的 ulna 来自拉丁语)；③借译 (如德语的 Nierenbecken 代替拉丁语的 pelvis renalis)；④独立于源语的新构词 (如德文的 Schlagader 代替 arteria)。分析显示，在前三种情况中主要用借用和借译表 LSP 术语，不同语言之间在选择借用还是借译方面有显著差异。可以推断，独立于源语的构词 (即其直义与源语术语的直义无关系的目的语术语) 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尽管借译是被偏爱的翻译方法，但未能产出理据性强的术语。

译者在该不该用西医术语来表示传统中医概念的问题上有分歧，一个经典例子是“风火眼”该不该非直译地译成 acute conjunctivitis，或直译成 wind-fire eye (如 Wiseman 2002a: 56; Wiseman & F'eng 2005a: 8)。使用西医术语方便，人们对此术语是熟知的，若直译则是强调：虽然 acute conjunctivitis 可能表示同一种疾病，但对疾病的理解不同于中文术语对疾病的理解。这两种相反的倾向分别称为源语导向和目的语导向的翻译方法。一些目的语导向的倾向中，某种程度的目的语表达方式和目的文化价值观尤其是目的文化医学价值观畅行无阻，优先于源语和源语文化价值观。除了使用现代医学术语外，目的语导向的一个表现在于用希腊-拉丁派生词作为中医术语的对等语 (李照国 1993: 9-10, 239-252)，如用 endoanemobatia 来代替“风气内动”，或者用 hepatosplenoatacia 来代替“肝脾不和”，西医术语的形式被强加给中医术语。另一个表现形式是用汉语拼音或大写首字母译写的英语对等语来表示内脏，虽然这无异于西医中普通的名称所表示者，但所具有的功能不同于西医中赋予它们的功能。例如，中医传统上认为肾具有生殖功能，而西医没有赋予此器官这种功能。

中医是多视角的知识库，许多热衷于现代医学价值的人认为它需要革新，选择理性的综合的成分，将针灸和医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方位地将中医与西医结合起来，使之适应于西方人的现代精神需要 (Seem & Kaplan 1996: 12; Beinfield & Korngold 2001: 133-136)。放弃基于它们的传统解释和程序在日本针灸中早有先例 (Birch & Felt 2006: 38-39)。但是，任何形式的中医都需要以反映它们原本和传统概念的方式来表达传统中医概念的术语，即使一些不同改造风格之一要成为西方主流，它也不大可能完全脱离中医在中国的历史根源。

只有源语导向译法产生的英语术语才能够完整无缺地传达来自中国或其他远东国家的传统医学知识，没有概念损失，没有增加和歪曲，而且确保概念被标示的方式在任何使用场合都有效（Schafer 1961）。如果称“风火眼”为 acute conjunctivitis，只有懂西医且认为西医在定义疾病方面更有权威的读者才会承认这样的译文的有效性。直译此词则可以让读者知道此疾病在中国是如何被理解的，而用西医对等语则将此屏蔽了。如果认为西医放弃了发炎之概念，那么将“风火眼”译成 acute conjunctivitis 则理据性不足，正如作为阴和阳和对等语的 humidus（湿）和 calor（热）理据性不足一样。

本研究的第一步是综述目前有关翻译的知识，寻求理论指导。翻译术语的任何一致看法可能在阐发中医学术语的翻译方法方面很有价值，然而讨论有关翻译问题的成体系的思想的历史并不长。事实上，翻译理论关涉翻译不同方面和不同类型的数个领域。在术语翻译问题上无明确的指导思想一直是中医传播的主要不利之处，翻译理论在中医西传的关键时刻可以提供更多的指导，因而，本书第1章将综述有关术语翻译的语言学的各个方面，包括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语文学翻译方法、借用的历史语言学理论、术语理论。

语言学翻译理论对如何翻译术语的问题关注不多，往往只泛泛地探讨词语翻译。Eugene Nida 讨论了圣经术语翻译成各种语言的情况，虽然他建议他所称的动态对等而非源语导向的形式对等，但其术语翻译，不同于其语篇翻译，源语导向程度高。动态对等的原则是指目的语文本对目的语读者产生的效果等同于源语文本对源语读者产生的效果，这种对目的语读者效果的关注渗透到翻译理论的几个流派，这些流派将语篇视为翻译的主要单位，往往忽略术语翻译的重要性。Peter Newmark 更加倾向于源语导向的方法，指出：在翻译某些语篇（如具有高度独特性、创造性的语篇或古代文献）时，我们不能对读者的意图效果确信无疑，在此种情况下，翻译必须是直译的（Newmark 1995: 11）。Mary Snell-Hornby 的综合翻译方法只是提及一下术语（Snell-Hornby 1988: 107）。

语文学是对文字和语篇的研究，目的是理解古代文明的文化特征。既是古代语言的研究，自然涉及翻译，因为目的是通过语篇理解文化，语文学翻译方法是高度源语导向的。中医术语翻译因其历史性而归于语文学翻译的范围。虽然中医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且不断发展，但它植根于其形成时期，此时期的早期经典至今被认为是权威性的。我们应该以适当方式翻译这些经典语篇来反映作者的思想，而不是将两千多年后形成的外来医学系统的概念框架强加于它们，以便透彻理解翻译过程的这些经典语篇。中医源头仍然是部分猜测性的，许多概念带有猜测性质，在这样的情况下，源语导向的方法之外的其他方法可能歪曲历史语境中的中医概念，而对中医西传作出贡献的汉学家没有完全意

识到这一点，这说明语文学翻译方法缺少在实践中经得起检验的严格而明晰的规则。

历史语言学完全不关心翻译理论问题，注意的焦点是语言发展过程中可观察到的事实，不过其观察是与翻译理论相关的。历史语言学告诉我们，双语和翻译如果在密切接触的语言社团中显得重要的话，就频繁采用借用（Lass 2004: 190; McMahon 2001: 200）。词汇借用主要采用借词和借译两种形式，前者直接采用外来词，后者是逐个成分翻译的语词。从翻译理论的角度看，借词和借译都是源语导向的对等语，历史语言学提供了大量的源语导向翻译的证据。词语借用的目的常常是给来自异域的不熟悉的物体或概念命名，如 banana、igloo、catamaran，两个相对密切接触的社团借用最多。知识和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彼此相互采用，接受方学习和使用借出方的文化并从事翻译，换言之，借用与借出方语言和文化的优势地位相联系。在本研究中，笔者将阐发在历史语言学中得到认可的概念，这一概念为：词语借用（即源语导向翻译）在某种程度上与借出方文化、知识传递和双语的优势地位正相关。翻译理论家还未充分讨论这些问题。

术语的研究可被视为属于专门用途语言（LSP）研究这一范围更广的领域，并与一般用途语言（LGP）形成对比。术语研究关涉术语与概念之间的关系及术语形成的过程，主要目的是确保术语有效代表概念。术语研究没有包括正创造出新术语的某语言中术语形成的指导性规则，不过借用和借译被视为术语翻译的常用方法，在一整套术语从零开始的语言中尤其如此。而且，术语学家认可的术语形成方法提供了根据源语术语划分目的语对等语的框架。虽然研究专门用途语言（LSP）和术语的专家关注的是现代专门用途语言，但他们的知识可用来分析缺乏严谨术语的诸如中医之类的古代医学。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语文学翻译、历史语言学借用理论、术语理论等诸多领域皆可为当前研究提供理论支持。关于语言之间借译的历史语言学观察是从理论走向翻译实践考察的主因，既然术语连同它们表示的概念一起被借用，那么就值得考察一下在不同学术领域多少术语被借用，多少没有被借用。在此历史语言学家没有提供有用的证据，因为他们主要对语言而非知识体的跨文化传播感兴趣，不过这般比较可能揭示中医中的术语翻译问题。

在第2章中笔者着手进行比较，并选择西医作为比较的基础，因其与中医关注同样的对象（人类健康与疾病），同样面临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对此方法存在着两个可能的反对意见：第一，西医不宜作为比较的基础，因为它在性质上与中医相差很大，然而，术语方面中医和西医有许多相似性，在比较过程中，重要的相似点和对比可以揭示出来；第二，所采用的翻译方法不一定是最佳翻译方法，不过，当某个翻译的知识库从一语言

社会传到另一语言社会时，在语篇翻译或术语翻译中检测翻译质量的标准为：知识库是否完整无缺地到达目的地，能否应用于新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如同在其源语环境中一样。西医知识传入中国和日本的过程中，西方医学治疗法（如心脏外科手术、整形外科、核医学）最复杂的成分同样被体现，如同在西方一样，译者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是不容置疑的。

通过对西医翻译过程的语言外背景的考察可看出源语文化、双语、知识传播和源语导向的翻译之间的相关性。如果一语言社会急于从另一语言社会获得知识，便寻求了解对方语言，采用源语导向的翻译方法。西医术语的三种不同的目的语译文皆为源语导向，这足以证明西医翻译的源语导向是有效的，促成西医术语源语导向翻译的因素也存在于中医学英译语境中，源语导向的术语翻译的确是可行和理想的。

为表明源语导向的大体直译方法是有效的，需要对已有的术语进行同样的分析。首先从更为一般的视角开始探讨中医术语翻译。为完全掌握术语问题，须理解中医的性质和其概念的特性。中医理论有臆测性成分，没有严密的逻辑将臆测成分和实证成分结合起来，因而没有发展成完全综合的知识系统。正是由于这些特征，翻译的语文学方法也就是情理之中了。

源语中术语的性质对术语的翻译方法有直接的影响（拉丁语的LGP术语和LSP术语过去以不同的方法英译），因而，为讨论术语翻译研究起见，有必要了解中文概念在中文中的表达形式，这是第3章的主题（中医术语的特性）。笔者将首先简述中文词语结构的特性，然后讨论中医术语构成的方法，应用现代术语学中产生的分析模式。西方文献中提供了不同的术语构成分类，但这些稍稍有所不同，考虑到中文词汇构成模式，笔者提出一个新分类法。大体说来，中医术语构成方法与现代科学技术术语构成法是相匹配的（LGP术语、术语化、合成词、借词，以及这些方法的结合），不过还是有一些明显的特征的：LGP术语众多，其中许多用于专门意义，如在多数术语系统中一样，中医中隐喻众多，这些隐喻不仅用于命名和描写实体，以及描述它们的形式特征（西医中主要使用隐喻），还用于命名和描写物体，借助的是它们的功能和关系。笔者还将探讨中医术语表达概念的贴切程度，考察术语在多大程度上是自我解释性的，在多大程度上实现术语与概念一对一关系，以及术语定义的明晰程度。结果表明：中医术语是非常有理据的，但因高度多义性、定义不明、模棱两可的同义词等缺陷，中医术语系统的所有这些特点都会对翻译产生影响。

在第4章中(中医的传播与翻译),笔者将描述作为文化现象的中医传播和接受的文化与语言方面,并描述这如何反映在术语翻译趋势中。既然成功的传播取决于源文化的文化优越感、承认源语为传播的关键、源语导向的术语翻译,那么中医要成功西传也需要同样的条件。因此,笔者认为,中医在西方的接受与它被视为补充的保健密切相关,这一看法限制了对其内容、文化背景的兴趣的范围,向其投射了对其理论和实践不是至关重要的概念。我们发现的不是培育双语能力和始于源语的知识传播的文化,而是低水平的双语主义、改写的倾向、低层次的翻译活动、各种目的语导向翻译的倾向。源语和目的语社会接触和交往频率低,我们不能期待大量的借用和借译形式,笔者比较了八位中医翻译研究专家提出的中医术语翻译论,发现其在使用拼音标注、拉丁语对等语、借译对等语方面显示出不同的倾向。

第5章(术语翻译方法推荐)提出中医术语源语导向翻译的方法,首先评估源语导向翻译中的两个选择——借用(注音的形式)和借译,提出拼音是翻译中不错的最后手段,但不能大量使用,因其基本上是非透明的。然后概述几个翻译原则,意在提出基于LGP对等语和借译的源语导向的术语系统,讨论了理据意义、语义翻译、翻译单位等基本概念,还讨论了LGP对等性和概念统一性的保持。继而解释LGP术语翻译原则的应用和用于引申意义(大多是隐喻性的)的术语,确定什么样的西医术语可用于中医中而不会破坏后者的概念体系;提供缩小目的语术语选择范围的程序(如比较成分分析),描述进行可舍弃语义翻译的条件。最后,笔者探讨将每个术语或每个术语成分的对等语的数量降到最低的必要性,使用用于西医术语系统中的同样程序,确定在根据所陈述的原则创造的术语系统中源语导向翻译取得成功的程度。所讨论的术语系统选自中医术语汉英数据库,此数据库不断扩展、不断修正以尽可能增加源语导向的程度,并已用于产出三部辞典式的著作(Wiseman& Boss 1997; Wiseman 2002a; Wiseman & F'eng 2005a),用于现代文本和古典文本的翻译中。此分析的目的不是判断所提出的术语的接受或可接受性,而只是说明源语导向是可行的,对所提出的术语系统的分析揭示,LGP对等语、借用和借译占了术语的大多数,比例远远高于西医,理由是中医中词语和概念之间的区分不够明晰,源语导向的翻译更可行。

概言之,本书讨论了中医术语跨文化技术传播中的问题,与先前类似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首次从多学科的视角讨论中医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作者认为,作为一种跨文化技术传播的中医跨文化传播涉及不同领域,因而需要在多层次语境中进行研究。本书使用了修辞学、语言学、跨文化传播、翻译学等学科的理论,对中医英语翻译问题进行多

层次、多角度的分析,分析了西医传播过程中西医术语的翻译方法、中医术语的文化内涵性特点及语言与修辞特点,评析了中外主要中医翻译专家的中医术语翻译观和翻译方法。根据大量的分析并综合诸多专家的观点,笔者提出,源语导向的翻译方法不仅在各个语言学分支中广泛被认可,而且被应用于十分成功的知识传播过程中,源语导向的方法能够忠实地反映中医概念,目的语导向的方法提供读者熟悉的术语,便于理解,但掩盖了中西医理论的矛盾,牺牲了中医原概念的完整性。中医跨文化传播所遇到的挑战不仅在于中医的文化依赖性(中医植根于中国哲学如道学,五行论是其主要体现),而且也在于其表达中医概念的中医术语之语言和修辞,要克服这些障碍,让外国读者能了解博大精深的中医,使中医得到有效传播,并使中医术语英译尽量标准化,可采用一般用途语言(LGP)对等语、借词、借译、独立于源语的新构词来翻译中医术语。

本书的意义有两个方面。第一,为中医的西传提供了指南,不仅为术语翻译提供了合理的方法,而且强调了语言作为知识载体的重要性和将对等语紧扣原文术语的必要性,还强调了因目的语导向的翻译而引起概念被曲解的危险,显示语言外因素是如何影响传播的。第二,在翻译理论方面,它提出的观点支持源语导向的翻译在语文领域和专门用途语言(LSP)之间重叠的领域中的作用,综合翻译理论的建立基于针对不同语篇类型而采取不同方法这一概念,在此语境下,它提供了适合主题具体需要的源语导向方法的例子,重要的是与影响翻译的语言外因素相联系。中医西传的命运取决于许多语言外因素,将来任何可能的结果就语言和文化互动的规律来说应该都是可以理解的。本书只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对研究或从事中医跨文化传播的人们有所帮助。

由于时间和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唐韧

2015年3月于宁波大学

目 录

| | |
|----------------------|----|
| 丛书序 | i |
| 前言 | v |
| 第1章 中医翻译相关理论和术语理论 | 1 |
| 1.1 中医翻译相关理论 | 1 |
| 1.1.1 相关翻译理论 | 1 |
| 1.1.2 中医文本与其他领域文本的区分 | 10 |
| 1.1.3 中医翻译的历史 | 11 |
| 1.1.4 谁是中医译者 | 12 |
| 1.1.5 中医翻译中的语言与概念理解 | 12 |
| 1.1.6 中医翻译中需考虑的具体问题 | 15 |
| 1.1.7 中医翻译评估和选择 | 19 |
| 1.2 专门用途语言和术语理论 | 19 |
| 1.2.1 专门用途语言的概念 | 19 |
| 1.2.2 专门用途语言术语的特性 | 20 |
| 1.2.3 术语形成 | 21 |
| 1.2.4 术语严格性 | 22 |
| 1.2.5 科技术语翻译的规范与统一 | 22 |
| 1.2.6 术语翻译 | 23 |
| 第2章 西医——源语导向翻译的实用模式 | 27 |
| 2.1 拉丁文医学术语的德语和英语译文 | 27 |
| 2.1.1 拉丁文术语的形成 | 27 |
| 2.1.2 翻译方法 | 28 |
| 2.1.3 一般用途语言(LGP)对等语 | 29 |
| 2.1.4 借词和借译 | 29 |

| | | |
|------------|----------------------------|------------|
| 2.1.5 | 独立于源语的构词 | 32 |
| 2.1.6 | 影响方法选择的因素 | 32 |
| 2.2 | 西医术语的汉译 | 35 |
| 2.2.1 | 目的和方法 | 35 |
| 2.2.2 | 结果 | 36 |
| 2.2.3 | 讨论 | 37 |
| 2.3 | 对中医术语英译的启发意义 | 47 |
| 第3章 | 中医术语的特性 | 49 |
| 3.1 | 汉语的特征 | 49 |
| 3.2 | 术语之形成 | 54 |
| 3.2.1 | 语义变化 | 56 |
| 3.2.2 | 词素变化 | 81 |
| 3.2.3 | 语法变化 | 91 |
| 3.3 | 术语学视角下的中医术语 | 92 |
| 3.3.1 | 中医术语理据 | 93 |
| 3.3.2 | 中医术语和概念的统一性 | 94 |
| 3.3.3 | 中医术语之定义状况 | 96 |
| 3.4 | 小结 | 100 |
| 第4章 | 中医的传播与翻译 | 103 |
| 4.1 | 西方对中医的接受及影响接受的社会文化因素 | 103 |
| 4.1.1 | 传播的历史 | 103 |
| 4.1.2 | 西方医学和科学思想的影响 | 106 |
| 4.1.3 | 中医的综合性和自然性特点 | 108 |
| 4.1.4 | 有限的兴趣 | 111 |
| 4.1.5 | 未能将语言视为知识获取的关键 | 112 |
| 4.1.6 | 翻译缺乏 | 114 |
| 4.1.7 | 双语词典滞后 | 117 |
| 4.1.8 | 调整 | 119 |
| 4.2 | 中医术语翻译的方法 | 121 |

| | |
|------------------------|------------|
| 4.2.1 Mann 的术语 | 122 |
| 4.2.2 Porkert 的术语 | 124 |
| 4.2.3 谢竹藩的术语 | 127 |
| 4.2.4 CEMD 术语体制系统 | 128 |
| 4.2.5 Maciocia 的术语 | 130 |
| 4.2.6 李照国的术语 | 131 |
| 4.2.7 Unschuld 的术语 | 133 |
| 4.2.8 Wiseman 的术语 | 135 |
| 4.2.9 总趋势 | 137 |
| 4.2.10 需要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 138 |
| 第 5 章 术语翻译方法推荐 | 145 |
| 5.1 借用(拼音译写)与借译 | 145 |
| 5.2 原则 | 151 |
| 5.2.1 理据性意义和语义翻译 | 151 |
| 5.2.2 翻译单位 | 154 |
| 5.2.3 保留一般用途语言(LGP)对等性 | 157 |
| 5.2.4 多元对等性和概念统一性的保持 | 162 |
| 5.3 翻译方法在中医术语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 164 |
| 5.3.1 翻译 LGP 意义上的词语 | 165 |
| 5.3.3 翻译引申意义的词语 | 169 |
| 5.3.4 西医对等语 | 175 |
| 5.3.5 缩小目的语的选择 | 177 |
| 5.3.6 对语义翻译的偏离 | 180 |
| 5.3.7 尽量减少多元对等语 | 186 |
| 5.3.8 术语源语导向翻译的程度 | 188 |
| 第 6 章 结束语 | 192 |
| 参考文献 | 195 |

第 1 章 中医翻译相关理论和术语理论

本章意在确立中医翻译相关理论及专门用途语言(LSP)术语翻译的方法。第一步综述当前有关术语翻译的语言学理论,翻译主题方面的文献浩如烟海,但综合的翻译理论才开始形成,翻译所引起的问题揭示了语言学分支中的某些非连续性。为了理解中医术语翻译的问题,我们必须了解翻译理论、借用理论、中医翻译的特殊性和术语理论中的趋势。

1.1 中医翻译相关理论

本节首先描述这两个文化领域中有关翻译的思想,指出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翻译理论的各种趋势并探索翻译的语言学、文学、语文学或人类学方法。中医翻译须应用基于中医文本的特殊性的翻译理论和原则,方能精确传达中医思想的要义同时又能为外国读者所接受。

1.1.1 相关翻译理论

翻译与语言使用共存,提出一个综合的翻译理论实属不易。翻译是源语话语在目的语中的再创造,因此,对翻译过程的理论解释与对语言的理论解释密切相关。众多翻译理论家,包括 Steiner(1975: 248-311)和 Newmark(1995: 100),都认为建立科学的翻译理论的确不易,虽然应该科学地研究翻译,但没有翻译科学一说。Bell(1991: 15-20)、Snell-Hornby(1995)、Baker(1992)却对建立综合翻译理论持乐观态度。不过,关注翻译理论的人来自不同的学科,只认识到各自领域的有限要求(Snell-Hornby 1988: 14; Baker 1998: 280)。

20世纪中叶以来,人们将语言学和其他领域的知识应用于所有的人类语言的翻译中,而不只是宗教和文学翻译中。翻译理论日益受到口头话语、写作、新闻、法律语篇、通告、指示语、报告、科技文章和广告的影响,《圣经》翻译通过 Eugene Nida 大大促进了翻译理论的发展,文学翻译继续起着主要的作用。现代语言学的兴起提供了有关翻译方法的问题的新见解,破解了直译与意译之争的僵持局面,翻译理论家对